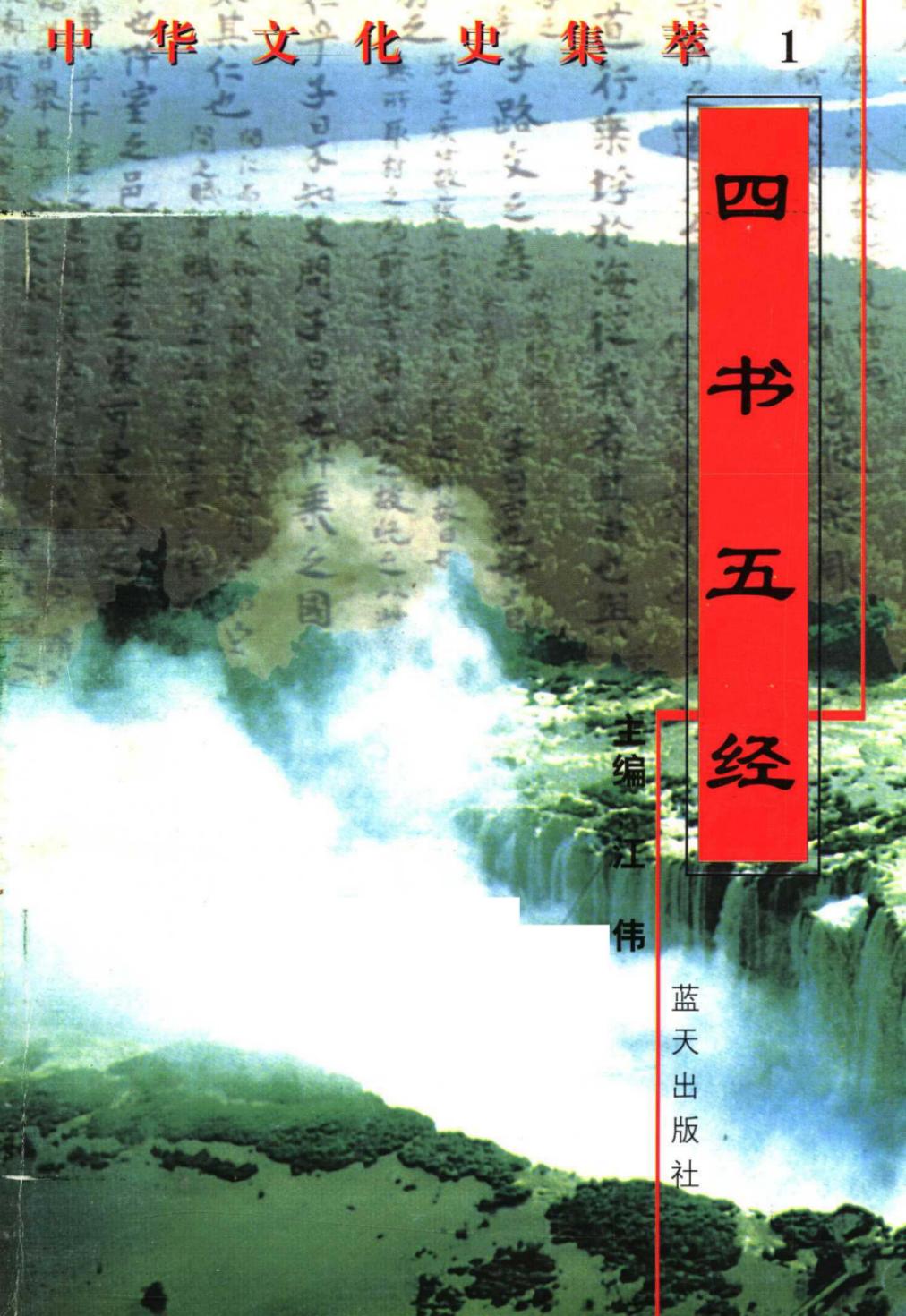


四 书 五 经

主编 江伟

蓝天出版社



**中华文化史集萃 (1)**

**四书五经**

**何 健 编著**

**蓝天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化史集萃/江伟主编. —北京:蓝天出版社,1998.5

ISBN 7-80081-820-9

I. 中… II. 江… III. 文化史-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3177 号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 14 号)

(邮政编码:100843)

电话:6678424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巨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64  $\frac{3}{8}$  印张 3757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套)

---

定价:286.00 元(全套 60 本)

## 前　　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历代炎黄子孙勤劳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先民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继承并发扬优秀的古文化，让它们服务于今天的社会，是当代国人，尤其是青少年所肩负的历史重任。

我们编写了这套《中华文化史集萃》丛书，从各个方面介绍中华传统文化。在范围选择上，注意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使之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面貌。我们力求用通俗平实的语言把各种文化现象，文化事物的来龙去脉，历史发展，当前状况等，作比较系统的介绍，使之尽可能清晰、逼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整个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注重实用性和借鉴性。我们希望这套书能帮助广大读者有效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髓，去其糟粕，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 目 录

一	《四书》《五经》的形成和发展	1
二	儒家思想的精髓：《大学》	24
三	思孟学派的代表作：《中庸》	37
四	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	48
五	记录孟轲言行的《孟子》	70
六	神秘的“群经之首”：《周易》	82
七	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	98
八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106
九	古代礼仪制度的记载：《礼》	112
十	我国最早的编年史书：《春秋》	120

## 一 《四书》《五经》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到了宋朝时期，阶级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此时期，不但民族矛盾尖锐，而且阶级矛盾也相当尖锐，农民起义和农民反抗斗争越来越多。例如，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北宋末期的方腊起义，两宋之际的钟相、杨么起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南宋时期，农民起义更是风起云涌，以农民为主体的各种武装起义，大小约二百多次。宋代的农民起义与以往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起义军曾明确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它概括了农民政治上要求平等、经济上要求均分财富的强烈愿望，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愈益尖锐，宋代的统治危机日渐加深，这样，如何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便成为当时封建上层建筑领域里一个重大而迫切的任务。《四书》正是为适应这种需要而形成的。

唐朝的官修经书注疏为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北宋初年，《五经正义》仍是官定的经书注疏，但是，北宋政府又派人校定了《周礼》、《仪礼》、《公羊传》、《穀梁传》正义，重定了《孝经》、《论语》、《尔雅》三疏，使官定经注的范围逐步扩大。后来，二程、朱熹等人又抬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单独作为一套经书，并为之作注，使之与《五经》并列，这是宋代统治阶级补充和加强思想统治政策的重大事件。元朝延祐年间，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悬为令甲，此后《四书》之名更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四书》几乎取代了《五经》在封建教育领域的统治地位，《五经》可以不读，而《四书》则非读不可。

《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原来分别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章，在南宋以前没有单独刊行过。在唐代，韩愈、李翱从维护儒家的所谓“道统”出发，十分推崇这两篇文章，把它和《论语》、《孟子》相提并论；到了宋代，程颢、程颐更是竭力推崇这两篇文章。关于《大学》，二程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人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关

于《中庸》，他们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他们把《中庸》说成为“孔门传授心法”。总之，二程对《大学》、《中庸》评价极高，推崇到了极点。

南宋的朱熹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也竭力推崇《大学》和《中庸》。他提出，《大学》是“为学纲目”。“修身治人的规模”，“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关于《中庸》，朱熹用伪古文《尚书》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诀来阐发其“传授心法”。他认为《中庸》“提絜纲维，开示蕴奥”，是“前圣之书”所不及的，要求学习者“得其辞而通其意”，把“孔门传授心法”，“诵习而传心焉”。

在二程和朱熹看来，《大学》和《中庸》，一个是“初学入德之门”，一个是“孔门传授心法”，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所以把它们从《小戴礼记》一书中提取出来，作为单行本刊印，并且和《论语》、《孟子》并列在一起称为“四书”。

《孟子》一书，在宋代以前，并没有取得儒家经典的地位，人们只是把它当作“子书”对待的。《汉书·艺文志》根据《七略》，列《论语》于六艺略，而列《孟子》于诸子略。赵岐《孟子题辞》说，汉文帝时，“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这是传记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那时，《论语》、《孟子》还不算“经”。西汉中期以后，帝师张禹传习《论语》，《论语》的地位随之显赫起来，但是《孟子》还是子书。其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史籍，都列《孟子》于子部，也都未尝将其视为经书。宋儒一反历代对《孟子》的传统看法，把它超“子”入“经”，这并非偶然，而是出于政治上扩大经书范围及重新注释经书的需要。

《孟子》地位的提高，与所谓“道统”说的发展直接相关。唐代的韩愈提出“道统”说，认为“道”就是仁义道德等“先王之教”，它从尧、舜以来一直传到孔、孟。认为孟子是“道统”的最后一人。提出“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韩愈的“道统”说和尊孟的态度，对宋代的“道学”的形成和《孟子》的超“子”入“经”影响甚大。

在宋朝，《孟子》虽被超“子”入“经”，但从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关于孟子的地位问题，思想学术界曾发生激烈的论争，直到朱熹著《读余隐之尊孟辩》，论争才告结束。从此，孟子的地位终被确立。

宋朝曾有一批思想家激烈地排孟、抑孟。北宋思想家李觏著《常语》，首先批判孟子。李觏指斥孟子以仁义“乱天下”，说孟子的仁义之说，与纵横家的欺骗、兵家的诡诈，来源虽不一样，而乱天下的结果则是一致的，认为孟子是“五霸之罪人”，指出韩愈的圣人之道由孔子传之孟轲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另一学者郑厚叔著《艺圃折中》，指斥孟子“挟仲尼以欺天下”，根本不是什么“贤人”，乃是“忍人”、“辩士”，资性轻薄。谓孟子口口声声“诵仁义”，实乃“卖仁义”。说孟子在齐宣王面前索要高价，想做大官，表现出“市井贩夫，行鬻鱼盐果菜之态”。嘲讽孟子同陈代、告子、万章、公孙丑等人的辩论，每次都“困而遁，遁而支离”，“沮气赧颜”，理屈辞穷。

著名大史学家司马光也曾著《疑孟》，批评孟子。司马光指出孟子做官，是“为礼貌而仕”，“为

饮食而仕”，是“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与郑厚叔之论相似。

还有冯休作《删孟子》，晁说之作《诋孟》，都排抑孟子。

二程、朱熹则继韩愈之后，极力尊孟。二程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又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二程以后，余允文（余隐之）写了《尊孟辩》逐条反驳李觏、郑厚叔等贬孟之说，为孟子辩护。朱熹则进一步尊崇孟子，在其《读余隐之尊孟辩》中肯定并补充余允文之说。朱熹谓孟子“出处大概”高不可及，称“《六经》如千斛之舟，而孟子是运舟之人”，认为李觏“不足以窥孟子之藩篱”，而好为议论，以“功利之浅”，诋毁孟子的“仁义”之道，是“不识圣贤所传本心之体”。朱熹批评郑厚叔的议论是“诡僻颠倒”，“好为太高之论以骇世”。

在统治阶级内部，虽有上述尊孟与贬孟之争，但毕竟“道统”论和尊孟之说更能迎合封建统治挽救思想危机的需要，故尊孟说最终能被官方所肯定和支持，孟子的地位被大大提高。朱熹的《读余隐之尊孟辩》实际为这场论争作了总结。

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在福建漳

州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汇辑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人们把这套经书简称为《四书》，从此，《四书》之名便广泛地流行起来。不过，朱熹编定的《四书》次序和现在通常所说的次序不同。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四书》的最初刻本，就是按照朱熹所说的这个次序编定的。后世由于《大学》、《中庸》篇幅较短，考虑到装订上的方便遂把两者并列到一起，于是逐渐形成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样的编排次序。

“经”，具有“经典”的含义，有一个演化、形成的过程。这个字最初作“亟”，始见于西周早期的铜器铭文，字形像织机的纵线，其本义为“织纵丝”。至西周中期，已写作“經”。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开始把重要书籍称作经。如《国语·吴语》在记述吴王夫差与晋国交战前情况时有“秣马食士”、“建旌提鼓，挟经秉枹”之语。韦昭注：“经，兵书也。”这是用经字称书籍的最早记载。稍后，诸子的著作称经的也多了起来，如《墨子》有

《经》上、下篇，《庄子·天下》说墨子门人“俱诵《墨经》”。《荀子·解蔽》也提到《道经》，清代学者郝懿行解为“古言道之书”。《韩非子》中的《内储说》和《外储说》，在叙述上分为“经”、“说”两部分。儒家书籍称经，始见于《庄子·天运》，文中说：“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此话不一定真为孔子所说，但它说明在战国中期这6部儒家典籍已合称“六经”了。上述兵、墨、法、儒各家之书都可称为经，可见此时经的名称还没有成为儒家书籍的专利，它只是重要书籍的通称。由于经往往语义重要，而文字简略，所以需要有“说”或谓之“传”作进一步的阐释。

如上所述，儒家书籍在战国时期已有“六经”之称，后来，到西汉时，也称“六艺”。如贾谊《新书·六术》中说：“是故内本六法，外体六行，以与《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史记·孔子世家》谈到孔子弟子时也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春秋战国时，儒学在社会上已有相当的影响，“孔、墨并称显学”。儒学虽然成为显学，但绝非“独学”，连后来长期被冷落的墨家之学也能与它并

驾齐驱，平分秋色。一生以六经宣传教育为己任的孔子，虽然四处奔波，寻求在政治上被进用，以贯彻他六经的主张，但总是徒劳无益，并且时常遭遇危难，不是受到冷遇，便是遭到排斥，有时还要饿肚皮，甚至遭到攻击，几乎丢掉脑袋，连他自己都承认“累累若丧家之狗”。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老家，退而删定他所尊崇的六经了，多年凄凄惶惶地趋附权门而难得一用，委实可怜。战国时另一位儒家“亚圣”孟子，也怀藏经典，游说诸侯，以求一得，也毫无结果。虽然他派头比孔子大了许多，常常“后车数千乘，从者数百人”，遭遇也好了许多，到处受到礼遇，不乏酒肉款待，但其主张不被认同这一点则是与孔子相同的，最后他也只好哀叹着归去，退而与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修撰他那部《孟子》了。降而至秦朝，儒家及其儒家经典的境况就更糟了，岂止是不被重视？简直交上了可怕的噩运！那位英雄而暴虐的秦始皇后来竟恨儒生入骨，作出“焚书坑儒”的举动，法律严到“偶语《诗》、《书》者弃市”的程度。经历了这一场浩劫之后，侥幸活下来的儒生窜逃山林，难觅踪影，儒家经典毁灭殆尽，其情尤惨。这就难怪后世儒家们一提及那位儒学克星秦始皇便恨得要死了。

“千古一帝”的秦始皇鞭挞宇内、扫灭六国，统一天下，何其壮也！遗憾的是，立国时间不长，不出二世便国破家亡了。后来儒者们抓住了口实，你看，秦朝不正是由于践踏儒学、不行仁政而导致灭亡吗？但实际上，继秦之后的汉高祖刘邦及其后的几位统治者并不一定这么看。那位“无赖”出身的“隆准公”刘邦似乎对儒生也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乃至他一见到那些峨冠博带、装腔作势的儒生们便心里生气。据说，他曾有一次当众羞辱儒生，一把摘下他看不顺眼的一位儒生的帽子，将一泡尿撒进其中。这口气如何咽得下？但是，经过长期磨难的儒生们进一步增进了忍耐的本领，他们相信，虽然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在战争年代用不上他们，但他难以马上治天下，和平时终有被重视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原秦朝的博士叔孙通后来竟被刘邦召去帮助制定朝仪，这真可谓适得其所、用其所长了。叔孙通带着他的一大群弟子废寝忘食，日夜不停地构思设计、排练演习，终于编制成功。首次举行之时，果真收到了奇异的效果，当群僚百官、文臣武将如同傀儡般被置于殿中，懵懵懂懂按着复杂烦琐的仪式程序朝拜皇帝的时候，当他们机械地叩首、肃立或三呼万岁之时，大殿里竟是那样庄严肃

穆，甚至令人感到恐惧，与原来桀骜不驯的武将们那种随便喧哗乃至酒后拔剑击柱的场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高高在上坐在龙椅上的刘邦喜形于色，情不自禁地喊道：“我今天才领略到做皇帝的尊贵！”皇帝如此高兴，叔孙通自然得到了重赏，当他喜滋滋将赏金分赠弟子们的时候，弟子们连连夸赞老师说：“叔孙先生真伟大，通达圣人的要务！”可见，这纯是一群没骨气的利禄薰心的人。这样的儒生，虽然取得了皇帝一时的欢心，但要得到真正的尊重和任用，则实属困难。

不只刘邦，尔后的文、景二帝也不甚重视儒学。此时期虽出现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但那是推行“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的结果，并非儒学造成的繁荣。不过，文景时期十分重视文化，已经摒弃了秦朝时的文化极端专制政策，不仅“除挟书之律”，而且还广求天下遗书，寻访学有专长的儒生，这对于后来儒学的复苏和兴盛十分重要。

到汉武帝时，儒学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他不仅要开疆拓土，建立赫赫武功，而且还要在文治上超越前人，建成统一强盛的大帝国。于是，他